

目 录

人 物 述 林

爱国民主人 事 胡文玉先生.....	市文史委 (1)
李基鸿略历.....	(16)
李基鸿协助蒋作宾办理的几件事.....	(19)
李基鸿先生二三事.....	李楚桥 (25)
忆先父李伯仁.....	李陟民 (29)
李幼棠的一生.....	廖洪波 (37)

· 政 坛 琐 记 ·

我在国民党应城县党部的点滴见闻.....	陈延年 (61)
我亲历的两次“民主”选举.....	陈瑞麟 (68)
罗唯进贪污案诉讼记.....	廖复初 李良英 (71)
汉奸县长周明钦其人其事.....	陈延年 (77)
我所知道的日伪应城警备队情报组	徐少勋口述 刘楚颜整理 (90)

· 往 事 漫 忆 ·

辛亥首义前后的亲历和见闻.....	刘新田 (10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- 构筑宁、沪战防工程和淞沪抗战亲历记…… 黄德馨 (114)
- 鸦片烟害在应城…… 宋纯清 (124)
- 追记应城旅省同学会…… 徐子樵 樊作楨 陈继实 (135)
- 我所经历的一次打豹经过
…… 王华廷口述 胡晨整理 (144)

· 膏 盐 史 话 ·

- 洞商“廖三家”经营始末
…… 廖复初口述 魏志才整理 (148)
- 我所知道的膏盐公司、公会及矿警大队…… 廖复初 (167)
- 洞商卢式生的葬事
…… 张大全、朱业精口述 付新华整理 (175)

· 蒲 阳 百 业 ·

- 陈松记营造厂纪实…… 蔡培根 (179)
- 我所经营的华阳旅馆…… 朱业精口述 李元清整理 (190)
- 汪和记糕饼店和茶庄…… 汪云卿 (197)
- 我在晋新广货铺的见闻…… 胡绥珊 (205)
- 永豫和杂货铺概略…… 宋树棠口述 杨志强整理 (212)
- 应城名中医撷萃…… 陈泽江 徐子樵 陈季鸾 (222)

· 文 海 拾 贝 ·

- 胡茂实先生的教学生涯
…… 褚远安 张树德 李君仪 (232)

简记民国时期应城的两所私立学校

- 李华元 雷一鸣等 (241)
- 长江埠的民间文艺活动漫忆..... 刘济生 (247)
- 记1947年的区、县运动会..... 程德骏 李韬 (255)

爱国民主人士胡文玉先生

(一)

胡玉文先生，原名胡鸣盛。应城城关人，1886年生。其父在北正街严家巷开有三间门面的杂货店，经营糖果、点心、酒、食油、香烛、鞭炮等，后因发生火灾。房屋被烧，又改营“生漆行”，一般人称之为“胡家漆行”。另在乡村有良田20多亩，家境尚可。他有兄弟三人，大哥胡省三、清末秀才，长于珠算；弟胡鸣珂，曾入北京大学专攻政法。未毕业即死于肺病。胡文玉自幼聪颖过人，四五岁时在父亲的指教下读文习字，且能背诵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、绝句。7岁入乡塾念书，11岁考进县立高等小学堂。翌年，因成绩特别优异，经校方特许提前毕业，免试进入德安府中学，先进预科班，后进德安府中学堂，学习期间，攻读经史典籍，能诗善文。1911年8月，他在父亲及大哥的支持下，赴汉考入江汉大学，先攻读历史，后改学法律，视野逐渐开阔，求学之志愈坚。1913年7月，邀请约同学刘博平（湖北广济人）等进京报考北京大学，其成绩名列前茅，于次年被北大录取，进入北大文学门中国哲学系第一班专修哲学。其时，恰逢章太炎在京主办“国学讲习会”，使师承章氏，研习经学、史学及诸子百家。1918年7月毕业，获北大“文学学士”学位，旋即受聘于北大国学研究所，协助整理明、清两朝档案，同时兼任国史编纂处湖北省名誉征集员。在此期间结

识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，并在他的启发影响下，开始同情革命，支持和参加爱国学生运动。“五四”运动中，几名同学遭致当局的通缉，他积极设法营救。帮助他们安全离开北平。1921年，胡文玉辞去北大的工作，到北平医学专门学校任教授。1922年5月，参加李大钊同志领导组织的革命进步团体——北平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联席会议，担任该会秘书，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，从事进步活动。

1924年9月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，10月，冯玉祥发动著名的“北京政变”，推翻曹锟。11月，成立北京临时摄政内阁。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。胡文玉以操守廉洁，学识渊博，被临时摄政内阁选任为清宫缮后委员会顾问兼清宫点查室主任，负责清查文物、开放清宫等工作。1926年，就任故宫博物院点交委员会委员，为清理故宫文物和筹备建立中国故宫博物院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故宫开放之初，按规定：凡参观人员，必须换着故宫特制的束袖无袋的参观服。如因故不能换服者，须经清宫点查室主任批准，方准参观。一日，“临时总执政”段祺瑞率领众官员前来故宫参观，为换服之事，段的随行侍从气势汹汹地责问接待人员：“段总执政参观。何须换服”？时胡文玉赶到，见状十分气愤，对其严正指出：“不遵守制度者，依例不得参观。此国家之规定，既身为总执政，更当以身示范”。段祺瑞闻之，忙装腔作势地喝斥侍从，并换上了参观服。

1927年4月，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下壮烈牺牲，胡文玉愤然辞职，从北平返回应城，和先期返乡的北大学生、共产党员赵保民、彭仲民等人，投身于应城的大革命运动。在此期间，胡文玉曾任应城县县民大会副主席兼

县总工会秘书。7月，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，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，应城的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破坏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应城县长王树勋见胡文玉才学超人，颇孚众望，即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县教育局长。任职期间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尽力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，遂为地方顽固势力所不容，并联名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胡文玉，说他“每当开会时，与共产党首领（指大革命时期中共应城县负责人）形影不离”。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多次严令应城当局查办。但应城县政府拿不到确凿证据。又慑于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压力，终以“品学兼优，合邑推重委长教育，共庆得人”草草结案，仍留胡继续任教育局长。

1929年8月，胡文玉辞去县教育局长之职，再度赴北平从事教学、学术活动，应聘于北平国立图书馆，与叶渭清、顾颉刚、梁思庄、谢国桢等人同为该馆编纂委员会委员。此间，他租住北平大石胡同内三间房屋，雇有一男仆，帮其料理生活。1931年冬，他致信家人，要其子茂陵、侄茂绩赴京念书，并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北平志成中学、华北中学就读。他的薪金除房租、仆人的工资（每月5元）4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学费外，仍绰绰有余。但他们的生活却很节俭，平时粗茶淡饭，周末买点肉打一回牙祭，别无其它开销。他冬天一身棉袍，夏天一套布衫，白天去图书馆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辅导子、侄的功课，茂绩、茂陵在他的培养下于中学毕业后，分别考入天津工学院和河北大学农学院。

1935年7月，胡文玉应邀赴青岛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。1936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继“何梅协定”后，有恃无恐。在河北、山东一带屯驻重兵，不断制造事

端，伺机发动侵华战争，蒋介石集团对日一再妥协，国内局势动荡不定。是年8月，胡文玉以休假为名，从山东回到了老家——应城。

(二)

1937年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。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，通电全国，大力推动并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，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。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。1938年8月，胡文玉送其子茂实、侄茂绩到武昌珞珈山“青年训练班”受训。行前，他满怀爱国之心，挥笔写下《送子实侄绩赴珞珈山受训》诗一首：“暴政深侵入，鄱阳作极边；妇孺罹害剧，朝野复仇坚。集任兴亡责，重施教育鞭；珞珈幸留意，救国几青年”。赠予茂实、茂绩，以勉励他们为抗战出力。10月，武汉、应城相继沦陷，子、侄返乡。这时，日寇横行肆虐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中华大地满目苍痍。胡文玉带领全家妻儿七口人离开城关，逃难至南乡，住葛蓬岗一亲戚家。1939年4月，日寇扫荡葛蓬岗，亲戚家遭难。胡文玉一家即从葛蓬岗迁至文峰塔附近之桥头湾暂住。不久，迁往黄滩镇，租借了张厚山老人的一间带阁楼的房屋栖身。此一住就是六年，直到日寇投降，才搬回城关。

到黄滩初时，胡文玉全家七口人的生活无着落，逃难时带的钱所剩无几，单靠亲友接济难以支撑。其子茂实领头凑了几个钱，在门前摆了个小摊，卖点笔、墨、纸张、小人书之类，维持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生活仍十分艰苦，吃的是粟米粥，咽的是咸菜，且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。在困苦环境

中，胡文玉告诫其子孙们：“宁可饿死，也不去当卖国贼。”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。一次，伪黄滩区区长周志齐来他们家“拜望”老师——胡茂实，请茂实或胡文玉出任伪职。并奉送一笔伪币，假接济生活之名，以利诱之。胡文玉严辞拒绝，并痛骂他不堂堂正正地做人，而去充当汉奸，丧尽天良，周志齐气得发抖，又慑于胡文玉的名望，不敢发作，只好悻悻而去。还有一次，日伪派陈志远率20余人，带着“厚礼”，来黄滩镇“看望”胡文玉，陈假惺惺地对胡文玉说：“您老乃地方名士，深孚众望。倍受推崇，理应厚遇。今学生带来一笔钱，权解柴米之忧。”并再三请他出山任职。还说：这一来可解生活困难，二来可避免一些麻烦。胡文玉以“朽木不可雕也，且身体有病”为由对日钞和任职之事婉言加以拒绝。陈志远无奈，只好带着人离开了他家。

平时，胡文玉住在小阁楼上，终日闭门不出，夏天又闷又热，蚊虫也多，冬天寒风呼呼，但他仍坚持每天看书学习，研习书法，修订古籍，写下了约20余万字的《唐诗选读》。他坚持不让孙子们上敌占区的学校，使其免受奴化教育的毒害。为了不荒废孙子们学业，他督促其子茂实辅导他们学习国文、英文，后来，其侄茂绩辗转来到黄滩镇，他便要茂绩辅导他们学习数学，自己也有时抽空指导孙子们读《左传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唐宋名家诗词等。这样使孙辈的兄妹三人在战乱时期不仅没有影响学业，而且都有所学，大有长进。当时，还有一些家住附近的学生慕名前来向胡文玉求教，他总是耐心地跟他们讲解所提出的一些问题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。

胡文玉隐居黄滩期间，我抗日民主政府也常派人去他家

探望。尽关怀之意，并送去《七·七》报等抗日进步刊物，供其阅读，使他们颇受教益，中共应城县委负责人樊作楷听说胡文玉一家生活上有困难，派樊作刚捐去100块现洋，接济他们。钱送到后，胡文玉坚持不肯接受，他对樊作刚说：“根据地军民的给养已经够困难的了。这些钱还是带回去供抗日杀敌之用吧。”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历时8年的抗战胜利结束了。此时，胡文玉一家从黄滩搬回城关，住马坊街县立中学内，其子茂实担任该校教员，胡文玉赋闲在家。1946年8月，国民党应城县文献委员会在新集街成立，胡文玉应邀出任文献委员会主委，主持应城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。1947年春，县文献委员会从新集街搬到公园内后，胡文玉在社会上找了几个有文化的青年人，开始着手收集整理、编辑“应城抗战史料”，1948年2月，完成了有五万字的“应城抗战史料”初稿，此稿以具体翔实的史实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应城的滔天罪行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资料。

（三）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，并积极吸收和鼓励他们参加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。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。1949年6月，应城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，胡文玉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出席大会。1950年5月，在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。是年10月，他以“特邀代表”的身份出席了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

议，被会议推选为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，对党和人民政治上的关怀和信任，胡文玉深为感激。他从此以极大热情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。1954年7月，胡文玉在应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应城县人民政府委员，并被大会推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。在省人大会上，胡文玉对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作了大会发言，他高度赞扬了宪法草案的意义、性质、作用，他说：

“……宪法草案巩固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成果，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大敌人的成果，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的。因此，我深深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，并保证在宪法正式制定后贯彻实施。”表明他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。《湖北日报》发表了他的这一发言。

1955年12月，胡文玉在县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应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，并分工负责文、教、卫方面的工作，长达13年。他虽然年高体弱，但总是尽职尽责地做好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工作。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发展应城的教育事业，经常为学校的教学质量、学生的入学、升学、教育经费、师资培训以及社会扫盲等问题。在历次的县人代会、县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建议、写提案，还常常主动找县长、县委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商量，寻求解决办法。早在1954年的县第一届人代会上，他和王育之先生即联名向大会提交了“新建中心小学，发展教育事业”的提案。此案建议在城关大南门内右侧划拨一块空地，由政府拨款，新建一所小学，将设在公园内的原中心小学迁入此。这个提案被大会通过，县政府

立即组织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付诸实施。一年后，新的应城中心小学（即现在的应城市实验小学）建成。该校的校园、校舍面积大大超过原中心小学，可招收小学生1000多人，50年代至60年代，应城教育经费比较困难，省教育厅拨下来的钱不够开支，胡文玉作为省人大代表，在省里曾提出这个问题，并为此向当时的省教育厅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，指出其在经费分配中有家乡观念，要求秉公办事、一视同仁。他要求学校的教师必须为人师表，对县里每年至少集训教师一次，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教学水平的作法，极表赞同。1957年，学校重视劳动教育，对课堂学习不大重视，他为此找县委文教部负责人提意见说：“劳动教育要搞，但学校应以教学为主，学生总得要读书，不读书就不叫学生。”在文化建设事业方面，胡文玉也提出过不少主张和建议。1953年，他向县政府建议将人民公园内蒋作均的“剿匪功德碑”拔掉，在原有基脚上树立“和平纪念碑”。之后，又和王育之先生共同提出修复“水阁凉亭”的建议，由于修复后还不尽完善，过了几年，他再次提出修缮计划，使之成为人民公园的一景。1956年，他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兴办应城图书馆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，此议被采纳后，他带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，在城关选择馆址、申请经费，挑选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并于当年就在原孔庙内办起了应城图书馆。他还亲自过问购买图书的事宜，其中全套的“二十四史”就是他直接向财政部门要钱买回的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以坦诚的态度与中共党员县长、副县长合作共事，敢于大胆工作。他竭诚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并积极做一些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，使他们团结在共

产党的周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有一次，县工商联副主任刘鸣新先生向他汇报思想情况，谈到如何同心同德跟共产党走的问题时，他说：“你是工商联的头，又是人民代表，你怎么走，别人也跟着你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马虎。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强学习，改造思想，和党同心同德，和衷共济……。”再如擅长电器修理技术的王长清先生，50年代开着“新华电料”商店，生意不错，但人手不够。本想带几个徒弟，却有顾虑，怕人说搞剥削。对此，胡文玉同他谈心时说：“修理收音机、扩大机，有利于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有利于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这是好事，人手不够，可以带几个徒弟，这对服务政治和发展技术都是有好处的，你可以放心地去干。”此后，王长清请了帮手，带了徒弟，业务得到发展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。他虽年逾古稀，仍坚持身体力行，坚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。1963年，县政府实行“县长接待日”制度，正、副县长星期五轮流值班接待，因考虑到他年龄太大，没有排他的班，但他坚持要参加这个工作，每逢到他负责接待的日子里，他总是热情接待人民群众，耐心地听取来访者的意见，反复宣讲党和政府的方针、政策，对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，他及时提请有关部门讨论解决。

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，胡文玉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1957年，应城一中学生闹事罢课、游行请愿，他和有关负责同志一同到县一中耐心地向学生们做宣传解释工作，他义正词严地对闹事的学生们说：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，可以向县委、县政府领导讲，也可选出代表和领导上直接谈，不要继续闹下去，也不要再去请什么愿，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容

许你们这样闹下去的……。”话未完，有个学生指着胡文玉大声说：“把这个老反革命拉下来！”面对污蔑漫骂，他毫无畏惧，继续耐心地对进行宣传、解释。由于县委、县政府采取正确得力的措施，有效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。此后，县里集训教师开展思想教育，胡文玉在集训会上讲道：“学生们闹事，我们作为教师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平时没有抓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特别是有个别人跟着瞎起哄？五四运动我参加过，那时的学生主要是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条约，和现在的学生闹事有本质的不同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做老师一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二要帮助、引导学生明确政治方向。”为学生闹事的问题，他还在家里把当时任县一中副校长的儿子胡茂实，狠狠地训了一顿，告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，丝毫不能含糊。

胡文玉担任副县长10多年来，生活上一贯简朴，一生不嗜烟、酒，平时穿的布衣布鞋。当时按他的级别和职务，可以享受吃中灶的待遇，但他坚持吃普通伙食，和大家打成一片。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，在政府院内开荒种地，并坚持自己锄草、施肥、浇水等，收获的果实却分给机关的干部吃，他为了减轻国家负担，与人民共渡难关，曾多次要求组织上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，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。在财政开支上，他处处为国家着想，如订阅报刊，他坚持自费；印刷著作，坚持费用自理。此外，他还十分关心下属的困难，当时机关干部为了抗灾度荒，在天鹅农场开荒种粮，收获后给他分了一份，他不接受，并解释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饭量小，粮食够吃，还是让你们年轻人多分点吧。”他为人谦虚，待人和蔼，对干

部、职工关怀备至。凡与他接触过的人，都能感受到这一点。凡到他的办公室、寝室去汇报工作或谈心的同志，不论职务高低，他都一律拿出自费的香烟、糖果招待，只要是抽烟的同志，必须拿3支。不然，他是不满意的。对待通讯员们，他更是体贴入微。每逢佳节，都要给通讯员5毛钱加餐，还督促他们在工余时间学习文化，规定他们晚上一般不准外出，要坚持看书写字，遇有不懂的地方，他手把手地教，对社会上有困难的人也尽其所能，设法予以接济。他家有一栋较大的房屋，自己一家人仅住其中的三分之一，其它给住房困难的居民居住，从不收取他们房租。有邻居经济为难时，他还资助其3、5元。对社会上有点才华的人，他更是怜惜，尽力相助。城关有个名叫吴经轩的人，是旧社会的破落公子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应城数一数二。当时他在剧场卖茶为生，因生意不好，生活无着落。于是到县政府找胡文玉请求帮忙，胡将其介绍到城关农民服务部工作，可他受不了单位的制度约束，不久即辞掉工作，又跑来找胡文玉。一段时间内，胡文玉每月资助其5元、10元，还鼓励他自立谋身，造诣书法，同时又恨他不成器，有时一边给钱一边骂他，对吴的徒弟姜文艺等人，胡文玉也曾送给笔墨、纸张，勉励他们学习书法，服务于人民。有一些亲友的子弟在外读书，向他写信求援时，他也慷慨相助。一次，他接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，信中说：“羽毛未干……”云云，通讯员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解释说：“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他现在还在读书，羽毛未干，生活上还有一点困难。”于是，他给那位学生寄出了20元，给“羽毛未干”的雏燕助了一臂之力。然而，他对自己的家属、子女要求甚严，从不允许他们

在工作、生活上向组织提什么要求，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，从未给他们谋取私利，凡已在生活上自立了的子女，在他的面前不敢伸手要钱，否则就要挨训。他的工资近百元，除少数用作生活外，一部分资助有困难的人，一部分积存起来留作著书立说之用。

(四)

胡文玉既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、党的忠诚朋友，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，他精通哲学、法学，而且对经学、史学、训诂均有很深造诣，尤精于文字、音韵及版本、目录、校勘之学。早年，著有《扁鹊仓公列传注》、《陈士元年谱》、《故宫杂钞》、《四库汇要目录索引》、《唐诗选读》等各种著作数十种。解放后，又著有《周濂溪》、《高似孙子略补注》、《陆贾新语注》、《唐妇女诗抄》、《木制农具结构图集》（与李必达合著）、《又玄集注》、《德安府艺文志》等。他的著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：其一录抄；其二补正；其三释注；其四选编。其研究范围涉及诗词、音韵、历史、典籍、哲学理论、医学、农业、军事诸方面。从本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，集精力和学识50年于一统。

他对古代优秀诗词悉心研究，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有失传之虞的诗词，抓紧时间，加以收集、注释、出刊发行，以传后世。《又玄集注》是他于1961年完成的一本唐代诗词注本，约10余万字。《又玄集》为晚唐诗人韦庄所编，分为6卷，该诗集共收入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崔颢等唐代杰出诗人的作品297首。其中有许多诗是我国流传诗集中未收录的，许多字句是我国流传诗编中没有或者大

相歧异的。“清人王士禛所著《又玄集》是伪书”^①，真本流至日本，后来，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夏承焘教授得知《又玄集》真本在日本，即请日本友人影印寄回中国，并送胡文玉一套，他倾注心力，博采众取，为《又玄集》作了注解，并自己出资，誊抄付印。在研究中，不囿于旧说，思路开阔，创见颇多。如对崔颢《黄鹤楼》中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一句。认为“黄鹤”乃人名，诗中“黄鹤”当是“白云”之误^②，并认为《黄鹤楼》诗及黄鹤楼故事在传抄中出现了“谬误”^③。《唐妇女诗抄》则集唐代女诗人精选之作百首，集中反映唐代广大妇女处境之悲凉和对社会的愤懑之情。而《韦庄词注》是对韦庄的《文靖集》重新校阅、订正、注释，以《韦庄词注》之名出版。

在研究历史人物、事件，订正典籍中，胡文玉将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运用于中。《高似孙子略补注》是他根据其好友——我国著名教授顾颉刚的校本而作。在补注本的序言中，他写道：“余因子略中墨子、公孙龙子战国策、王充论衡诸书，颇有学习辩证唯物资料，因特根据顾君校本，将子略撰者之略历得子书传行梗概——加以补注。”他对人说：研究某一著作，仅研究那一本书是不行的，还要研究作者本人。仅研究作者本人还不行，还必从多方面的资料分析当时作者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倾向。即“读其书，研究其书，必知其人；知其人，必知其家，必论其世”。他所著的《陈士元年谱》即是如此。使读者从这本著述中，就能知陈士元其人、其身，以及他的思想行为、功绩，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。按他的话说，即：“我们研究陈士元其价值也就昭然。”

他钩沉辑佚，用力校勘，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

上，对某些问题提出独特而富于启发性的见解。在整理《德安府艺文志》中，他对材料出处的真伪考证，证引繁富，言之凿凿，有些确无证可稽的难证史料或向来说法不一者，不妄下定论。在编辑、整理工作中，他提出：“在训释文字之外，包括考证年代，校勘异文，流通章句，详论文学等，都力求对初读方便，深入浅出。”
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胡文玉晚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学习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他担任副县长期间，除处理日常工作外，坚持学习研究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五位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，随时摘录纲领，分类编纂，积日已久。195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时，他写成并出版了《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年表》。作为向建国10周年的献礼。此书约4万余字。记述了恩格斯的主要生平、大事，刊行后受到各界好评。因印数较少，不能满足需求，故于1962年再版。此后，他继续写作，1963年建国14周年时，又出版了《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年表》，使两个年表成为“姊妹篇”，让人们一并阅读和了解这两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一生。“使人革命精神坚韧”。（该书序言语）。1966年，胡文玉已年届八旬，仍雄心勃勃，辛勤耕耘于马列学说，完成了《伟大革命导师列宁》的写作，并付印问世。此书包括列宁的年表、主要著作、重要言论三个部分，约30余万字，倾注了老先生暮日垂年的心血，也表达了这位爱国民主人士晚年对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敬仰和执着追求。他计划在有生之年，完成斯大林、毛泽东两个年表，却因“文革”爆发的影响，加之体力、精力难以支撑，终未如愿以偿。

胡文玉多年的积蓄用以著述立说，他不肯给国家增添